

祝尚书 著

宋代科举与文学

中华书局

祝尚书 著

宋代科举与文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科举与文学/祝尚书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12

ISBN 978 - 7 - 101 - 06389 - 9

I. 宋… II. 祝… III. 科举制度 - 关系 - 古典
文学 - 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D691.344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345 号

-
- 书 名 宋代科举与文学
著 者 祝尚书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6½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389 - 9
定 价 88.00 元
-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	7
第一节 科目概述	7
第二节 诸科的置罢	8
第三节 制科的置罢	15
第四节 词科的设置	30
第二章 宋代进士科的考试	43
第一节 由诗赋策论之争到诗赋经义之争	44
第二节 “诗赋优越论”与“经义优越论”	46
第三节 诗赋经义之争由对立到调和	52
第四节 诗赋经义之争平议	62
第三章 宋代诸科、制科与词科的考试	66
第一节 诸科的考试	66
第二节 制科的考试	72
第三节 词科的考试	88
第四章 宋代科举考试的糊名与誊录	98
第一节 糊名誊录制的由来与确立	99
第二节 糊名誊录的程序	103
第三节 宋人对糊名誊录制的争议	104
第四节 糊名誊录制的利弊得失	109
第五章 宋代科举的发解试	113
第一节 宋代考试周期的变迁	114
第二节 发解制度述略	116
第三节 徽宗时的学校升贡	130
第四节 发解试贡院	133

第五节	发解中的锁厅试与别头试	137
第六节	发解中的“解额”问题	143
第七节	发解中的“寄应”问题	148
第八节	宋代发解制度的得失	152
第六章	宋代科举的省试	157
第一节	举子赴省	157
第二节	省试条制述略	163
第三节	省试机构、知举官及考试流程	167
第四节	省试的奏名数额	185
第五节	省试录取不均与“五路法”	189
第七章	南宋的四川类省试	195
第一节	类省试:兵戎中的权宜创制	195
第二节	四川类省试的制度变迁	199
第三节	四川类省试进士的待遇	205
第四节	四川类省试的地位与作用	209
第八章	宋代科举的殿试	214
第一节	殿试制度的由来	214
第二节	殿试的程序	218
第三节	殿试中的“特奏名”	238
第四节	宋代的“赐第”与“宾贡”	241
第五节	殿试的历史作用	244
第九章	宋代的科举时文:诗赋	247
第一节	科举诗赋及其程式演化	248
第二节	宋代科举诗赋的命题	252
第三节	宋代科举诗赋的声韵	257
第四节	宋代省题诗的作法	261
第五节	宋体律赋的作法	267
第六节	宋代科举诗赋的评价问题	275
第十章	宋代的科举时文:策论	284
第一节	策论及其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284
第二节	策论的命题	289
第三节	宋代的试论	292

第四节	宋代的试策	303
第五节	括套与试策	310
第六节	策论考试的利弊与影响	314
第十一章	宋代的科举时文:经义	321
第一节	现存宋人经义考	322
第二节	宋代经义的分期与程式	324
第三节	庆历嘉祐时代的经义:以苏轼为例	328
第四节	熙丰时代的经义:以张庭坚为例	332
第五节	徽宗时代的经义:以刘安节为例	334
第六节	关题、合题与南宋经义	337
第七节	经义的流弊	344
第十二章	宋代科场的作弊与革弊	350
第一节	“作弊”概念的界定	350
第二节	宋初的进士行卷	352
第三节	宋代科场的举子作弊	355
第四节	宋代科场的官吏作弊	360
第五节	两宋朝廷的革弊对策	364
第六节	宋代科场弊坏的历史教训	369
第十三章	宋代进士的恩例与庆典	372
第一节	皇帝的恩例	372
第二节	进士的期集庆典	381
第三节	有司注官授职	388
第四节	恩例庆典与科举的公正性问题	392
第十四章	宋代的科举用书	397
第一节	宋代科举用书的编纂	398
第二节	宋代科举用书的刊行	402
第三节	类编类科举用书	406
第四节	时文类科举用书	412
第五节	文法研究类科举用书	417
第六节	宋代科举用书的利弊	422
第十五章	宋代科场的学风与文风	426
第一节	北宋前期:怪僻与庆历“太学体”	427

第二节	北宋中后期:道德性命之学	439
第三节	南宋初中期:由谀佞回归欧苏	453
第十六章	宋代理学与科举	470
第一节	绍兴中:理学开始介入科举	471
第二节	孝、光间:理学在科举中时占上风	475
第三节	庆元中:科举厉禁理学	479
第四节	宋末:理学占领科举阵地	482
第五节	理学对科场时文的影响	486
第十七章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492
第一节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492
第二节	“科名前定”文献及分类	496
第三节	科名主宰神:文昌梓潼帝君	507
第四节	“科名前定”与士子求神问卜	513
第五节	“科名前定论”的历史成因	517
第十八章	宋代科举制度对文学发展的促进	520
第一节	科举带动了教育的蓬勃发展	521
第二节	应试化教育训练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功	528
第三节	科举制度是宋代文学家成长的沃土	532
第四节	科举搭建了诗文创作的宽广平台	539
第五节	科举是小说戏剧取材的富矿	545
第十九章	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悖反	549
第一节	有司较艺与文学规律的悖反	550
第二节	举子程文与文学精神的悖反	557
第三节	从进士改习与元初废举看“悖反”	563
第四节	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悖反的影响	570
后记		575

绪 论

公元960年新春伊始,中原大地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后周皇帝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提师北征契丹;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发动兵变,一时黄袍加身,乾旋坤转,后周这个才六岁多的小皇帝不仅无力回天,孤儿寡母连说半个“不”字的底气和胆量也没有,只得乖乖地接受“禅代”的事实。于是,一介武夫的赵匡胤建立起了个烜烜赫赫的大王朝——宋,五代十国瓜剖豆分的混乱局面从此宣告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章。

宋太祖赵匡胤虽出身行伍,却深明文治的重要,登基后不久便“杯酒释兵权”,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而“五星聚奎”,更成为唐末五代以来文运逆转的一个历史性文化标志。^① 历代嗣君因之而不改,文采风流,朝野交辉。宋朝虽从来没有实现过国家的统一,大多数时候内外交困,甚至转徙流落,偏安一隅,其社稷却延续了三百二十年之久;虽国势积贫积弱,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象杜甫《忆昔》诗所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的有唐“开元全盛日”的盛世局面,却创造了空前灿烂辉煌的文化。宋末人吴渊在《鹤山先生文集序》中说:“艺祖(太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末句虽然是不实的套话,但“文治彬郁,垂三百年”倒是事实。别的不说,就以肇自隋代的科举而论,历唐至宋方制度大备:增加了殿试,实行锁院“较艺”,糊名、誊录,维护着“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至公”原则;科目设置逐渐由多科向一科(进士科)过渡;考试内容则由“浮靡”的诗赋向“有用”的策论、经义倾斜,甚至一度用经义取代诗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学校,太学上舍上等可以直接授官,中下等可免省试、解试;等等。有宋一代开科一百十八榜,每榜取人约为唐代的五倍,元代的近三十倍,明、清两代的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太祖乾德五年(967)三月,“五星如连珠在隆娄之次。”又《宋史》卷二《太祖纪二》亦载是年三月“五星聚奎”。奎主文章,故宋人以此为文运大开、人才辈出之兆而时常提起。

三至四倍,进士总数达十万至十一万之众。^①这些拥有“出身”的精英们,占据了国家上至宰辅、下至各级政府要害部门的重要位置,对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应当看到,在广大城乡,读书虽以应举为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学业不佳、财力不济等),未必凡读书皆应举,读书人数实际上远大于应举人数,估计有一两千万之众。他们虽没有“科名”,但仍是里邑的有用之才,对城乡建设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未必小于登科者。

科举由隋、唐历两宋,下至元、明、清,至清末方寿终正寝,前后达一千三百年之久。其间有关科举制度、科举考试的记载,朝廷的相关政令,臣下向皇帝上过的奏札,文人的议论、诗文,为配合科举而编写的各类书籍,真可汗牛充栋,甚至还有各地修建的贡院、文昌庙之类,为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和实物资料,是传统文化宝库中一笔巨大的遗产。清理和研究科举及科举文化(包括科举与文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掘其中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是学术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在这个研究中,宋代科举承上启下,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无可争议地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而欲研究有宋一代之历史、哲学、文学等等,科举问题是个绕不过的“坎”;而科举自身又以其丰富的内涵,不仅足以引起人们步入其间的浓厚兴趣,而且能让你收获丰硕。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文学研究历来是显学。科举本来就是“以文章取士”,这个“文章”包括了诗赋及骈、散各体文,只是考试所用文体逐渐程式化,便自成一类,被人称作“时文”。科举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宋时代的学者便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上世纪。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启发我们,把这个研究推进到宋以后各代,既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完全可以做到。事实上,经过中外众多学者的不断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重要环节。

一是科举制度研究。早在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即出版过邓定人的《中国考试制度研究》。1960年,台湾学者李正富出版了《宋代科举制度之研究》,当是专门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第一部专著。1969年,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出版《宋代科举制度研究》。1971年,台湾学者王德毅出版《宋代贤良方正及词科考》。

^①参见龚延明《〈宋登科记考〉札记》,收入著者《中国古代职官科举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1985年,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出版英文版《宋代科举》(1995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中文版)。近二十多年来,大陆出版了不少通代性的科举史、教育史专著,其中都涉及宋代,而发表的相关论文亦不少,主要也是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考察。前修时贤的成果不菲,功不可没,他们都为宋代科举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勿庸讳言,就总体看,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尚缺乏全方位的、深入其里的力作,论著数量、质量似逊于唐代,而宋代科举制度及所涉问题又极其复杂,需研究的课题很多,无论在宏观、微观方面,现有成果都还不惬人意。制度研究是科举研究的基础,如果不考察清楚一代科举制度演变的来龙去脉,其他就谈不上。

二是科举文体研究。宋代科举考试继承唐制,所用各体文,包括诗赋、策论、经义等,都是利用传统文学的体裁,但又根据考试的需要,对这些文体进行了改造,主要是设置程式,并逐步将程式固定化。比如赋,我们都知道自唐代开始,科举考试就用“律赋”,但宋代的律赋又与唐体有别,它不仅限韵,而且要限用韵次序;不仅要讲究起承转合,而且要八韵贯通体贴,十分严格,一字不慎,便入黜格,故秦观将它比作填词,实际上比填词还要难。又如经义,它由经论发展而来,王安石用它取代诗赋,但后来也高度程式化,且讲究对偶,宋人认为它有如赋,一直发展为明、清的八股文。程式化了的场屋时文,与传统文学拉开了距离,甚至发生着质的蜕变。若不对科举程式文体进行深入探讨,将此“文”与彼“文”混为一谈,就无法认识科举时文的真面目。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相当薄弱。

三是科举与各种思想文化之关联互动研究。宋代对社会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各个学术派别,象以苏轼为首的蜀学,王安石“新学”,程朱理学等,都对场屋学风、文风影响极大,有的(比如理学)甚至改变了科举的方向。科举号称是任何人都可以“投牒自举”、全民参与的盛事,与各个阶级、阶层民众的关系十分密切,对社会心态、民风时俗影响很大,并形成关联互动,塑造、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这些领域的研究,目前几乎还是空白。

四是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欲研究科举与文学,必须以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为基础。事实上,就广义的文学而论,科举时文研究也就是文学研究;但因为时文对传统文体作了重大改造,在本质上已成了科举考试的工具,而与现代的“文学”概念出入较大,于是又冒出个新问题:科举时文算不算“文学”?对此,目前学界分歧较大。其次,科举与文学,包不包括与科举相关联的文学创作?早在唐代,围绕科举就已产生了不少文学作品,而宋代参与创作的人数更

多,题材范围更广,作品数量更大,如鹿鸣宴诗(包括词,下同),举子赴试的行役诗,考官的贡院唱和诗,举子之登第凯歌、下第悲歌,同年唱和诗,以及以科举制度、举子活动为背景或题材的文言、白话小说及戏剧,等等。在笔者看来,场屋诗赋、策论、经义等是科举考试自身的必然产物,本书理当重点研究,故将“科举文体研究”作为研究的一大方向,已如上述;而在科举环境或背景中孕育孳生的文学作品,则应当与场屋之作有内外之别,故本书主要在揭示它与科举之间的契合点,或者说指出附着于科举机体上的文学生长点,并分别举例及作简要的论述,但不将它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这样做既是欲分清主次和内外,当然也与控制篇幅有关,否则难以收束。再次,宏观而论,科举对文学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或者在哪些层面是促进、哪些层面是“促退”?学者们亦分歧较大,甚至持论截然相反。这个问题也许难以一下子达成共识,但可以向通往共识的方向努力。因此,在论“科举与文学”时,所谓“文学”似不必局限于一成不变的概念,也不必拘泥于一个层面,这样也许更通达、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

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宋代科举与文学”这么个庞大而复杂的课题。我们拟以上述四大环节为基本框架,用十九章展开并涵盖相关的内容。可想而知,这个课题既有诱惑力,又极具挑战性。

宋代科举及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盖主要有如下难点。

首先是文献浩如烟海。较之唐代,宋代的科举史料极为丰富。《宋会要辑稿·选举》、《文献通考·选举考》、《宋史·选举志》等书集中记载和论述了宋代的科举制度,这是基础文献;但散见于野史、笔记、类书、小说、学术专著、书目、特别是文集中的科举史料,远比上述诸书繁富复杂,鲜活而生动。任何欲涉足其间者,都必须沉潜在这个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穷搜博采,探源讨流,然后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将研究建立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科学的结论,否则要么是“炒剩饭”,要么是游谈无根。

其次是议论多如牛毛。宋人好议论,任何主张一旦提出,无论动机如何,几乎都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此唱彼和,或一言九“顶”,而且有的言不由衷,真假难辨,在科举问题上尤其如此。比如,即便自身大受其益,衷心拥护,但口头上照例要说科举的“坏话”,仿佛是一种时髦。如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状元姚勉(1216—1262),曾在殿试之《廷对策》中抨击科举不遗余力,^①大有立即废罢而后快之势,但在稍前所作《发解谢判府蔡寺丞启》中却说:“不为应举觅官之

^①《廷对策》载《雪坡集》卷七。

谋,无以行致君泽民之志。故英人伟士,亦屑于科举之学;而名公钜卿,率由乎进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曰修举业以及第;紫阳前辈,且尝自儒级以发身。虽进以文,无悖于道。”^①他的哪些话可以相信?似乎宁可信其《启》中语,而廷对时的激烈言词,不过是故作惊人之论以吸引考官罢了。当然,对科举真正持批评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宋代有的学者怀念上古的所谓“乡举里选”,认为科举是隋代衰世之政,主张废除;但更多的人则认识到“乡举里选”的时代早已一往不复,于是转而批评科举之弊,希望对现有的“篱笆”进行修补。如此等等,难以具述。如何评价这些是是非非?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应当认识到,这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观点可以有許多,但事实只有一个。议论多是好事,可为我们提供多重视角,但又必须折衷其间,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人云亦云,淹没在“口水战”中,就没有了“主心骨”。对科举这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决不能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让人信服的分析,得出符合史实、经得住检验的结论。

再次是制度变化多端。宋人不仅爱议论,又喜改革,好立法和变法。特别是两宋频繁的党争,莫不立刻反映到科举制度中来,两者相互纠缠,往往朝令夕改。如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去留标准、录取规模等等,相关的条制格法、奏章诏令之夥,以致更改之速,变动之大,令人眼花缭乱。在历史上,就科举的制度变迁而论,无论有唐还是后来的元、明、清,都远不能与宋代相提并论。这既决定了宋代科举研究内容之丰富,也大大增加了材料梳理、是非评判的难度。

最后,研究者要具有历史的眼光,尽可能“复原”历史,充分尊重历史,同时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认识历史。对宋代科举制度的变迁,以及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既不能以今揆昔,要求古人该如何做;但也不能认为凡存在皆合理,为古人辩护。我们不能停留在前人甚至今人已有的结论上,而要站在他们的“肩”头,在新的起点上努力攀登,得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比如如何评价封弥誊录、锁院“较艺”,如何看待王安石以经义取代诗赋的科制改革,如何认识科举文体的程式化,如何定位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甚至如何解释“科名前定论”,等等,棘手的问题多如牛毛。若提不出自己的新见,或者所谓“新见”站不住脚,都将直接影响研究的价值和成果的质量。

当然,难点还很多,比如必须懂得宋代的政治史(特别是党争史)、思想史、教育史;又比如,人们都说宋代科举制度承上启下,那么研究宋代,就必须了解、

^①《雪坡集》卷二三。

熟悉唐代和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否则就宋论宋,不仅限制眼界,也理不清头绪。等等。总之,本课题“战场”大,“战线”长,涉及面广,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要攻破这么多“堡垒”,恐怕是“知易行难”,至少也是力不从心。尤其是识浅学陋如笔者,目标虽然明确,却未下笔已战战兢兢,何敢妄所覬覦,只能孜孜以求罢了。

清末科举被废,是它自身病入膏肓的必然结果。废罢后的百年间,曾经是一边倒的否定,倒是外国学者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研究著作,并将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官制度相比较,得出肯定的结论。这个局面,近二十多年来发生了根本改变,国内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热情出奇地高涨,扭转了长期以来将科举妖魔化的倾向,并发出了为其“平反”的呼声。但对科举制度、进而对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是完全正常的。“百家争鸣”仍然是最理想的学术环境,也是每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胸怀和精神境界。在本书中,笔者可能不十分赞同学界的某些说法,但仍然对同行的意见表示尊重,并认为自己的看法也仅仅是一时之见,最多是“一家之言”,未必一定发现了什么“真理”。

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首先提出“科举学”的概念。据他考证,“科举学”或“科举之学”其实古已有之,^①为“科举学”发掘出更深厚的历史底蕴。笔者很赞赏这个学术概念的提出,以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科举都是可以立“学”的。当然,要在学界达成共识,还需要加强研究,以丰厚的学术积累为支撑。好在目前“科举学”研究方兴未艾,涌现了大批颇有质量的论著,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科举学”是个十分庞大的文化体系,可研究的范围极为广阔,可选择的题目也极其丰富,“科举与文学”只是这个体系中一块小小的“领地”而已。笔者不敏,试在“宋代科举与文学”这块更小的“公有地”上耕耘劳作,不敢言收获,只是想为“本行”即宋代文学和文献研究添砖加瓦而已,若能旁骛而有助于“科举学”大厦的建构,那就有些过望了。

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第一章《科举学引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一章 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

科举的“科目”，有如竞技体育的“项目”，项目一定，运动员才有竞赛的内容和竞争的对象。宋代的科目，大体承袭唐制，分常科、制科两大类，但具体科目又有所因革，不尽相同。北宋末，增置所谓“词科”，它与常科、制科都有区别，是宋代自创的一个科目。

第一节 科目概述

所谓“常科”，简言之即常设之科，朝廷预定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定期举行考试。唐代的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而其中的“明经之制，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①唐中叶以后，常科以进士科最受社会的重视，成为举子们主要攻习的对象。

宋代的常科科目，《宋史·选举志一》叙曰：“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九经”以下至“明法”九科，宋代一般不叫“明经”，文献多统称为“诸科”，而另设有“明经科”，盖相区别故也，——但也有称诸科为“明经”的。就考试方法论，诸科与唐代明经科大体相似，但另设的明经科则不尽相同（增加了大义及时务策），这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除常科外，唐、宋皆有制科。所谓“制科”，又叫“制举”。《通典》卷一五曰：“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又《新唐书·选举志上》曰：“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即是说，它不是常设的考试科目，而是根据需要设定科名（“标其目”），由皇帝临时下诏，随时都可举行考试。故《宋史·选举志二》曰：“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唐代制科

^①《新唐书》卷三四《选举志上》。其中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不纯是贡举，同时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科目》。

所标之目,或据实际需要,或因皇帝喜好,名目极其繁杂,清徐松《登科记考·凡例》引宋末学者王应麟《玉海》、《困学纪闻》,有五十九科、七十六科的记载,而据徐氏所考,以为“无虑百数”。宋代的制科时置时废,远没有唐代的兴盛,更没有唐代那么多名目,以仁宗天圣七年(1029)所置十科最全,十科的科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高蹈丘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书判拔萃。^①这些科名,基本上是唐五代所原有,只是有所合并或名称文字略有变化,如唐代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两科,五代已合为一科,宋代因之;唐代有“军谋越众”科,宋代设“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等。

除上述外,北宋末设置所谓“词科”,最初叫“宏词科”,后改为“词学兼茂科”,最后改为“博学宏词科”。这是专为培养四六文写作人才而设的。其科名源于唐代制科,考试方法与制科有相似之处,但又定期举研,如同常科。它到底属常科还是制科,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与其强分于某一科,不如独立单列为宜。

以上是宋代科举科目设置的大概。较之唐代,无论是常科还是制科,科目都更加规范化,减少了随意性,并逐渐向“杜塞他蹊,专尚进士”的方向发展。^②

宋承唐五代之风,以进士科为举子追逐的最大热门,而它作为主要的考试科目,也一直屹然不改,只是在考试内容即主要以双赋取士还是以经义取士上争议甚大,以至哲宗元祐时采取折衷措施,分设“经义进士”和“经义兼诗赋进士”,南渡后又分为“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关于进士科的诗赋与经义之争,问题复杂,我们将结合该科考试进行专章研究;而诸科、制科、谏科的设置,也无不几经曲折,多所变化,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考述。

第二节 诸科的置罢

宋代科举中的常科,除进士外,还设有经、传、礼、史、法等科目多种,统称“诸科”。宋代的诸科,包括唐代旧有的诸科和明经的科目。《宋史·选举志一》曰:

宋之科目,有常科,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初,礼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书判拔萃”同时又是吏部科目选的科名。

②郭见义《创建三元庙碑》,《粤西文载》卷三七。

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所述不够准确:“诸科”属于常科,它与常科是包涵而非并列关系。在宋代的科举体系中,诸科的地位较进士科低,^①但历科所取人数不少(普遍多于进士科),其中也不乏翘楚之材。诸科曾在熙宁中被王安石废罢,而馀波却延及徽宗时代。

一、诸科的设置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曾下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②则有宋开科伊始,就设有诸科。乾德二年(964)九月十日,权知贡举卢多逊奏,“请准周显德二年(955)敕,诸州发解进士……诸科”云云,^③知宋初诸科与进士科一样,皆沿后周之制。又乾德四年(966)二月二十二日知贡举王祐上言,称“进士、诸科合格者一十五人”,^④则诸科至迟于是年已明确记载有人中选。开宝五年(972)二月,“礼部试到进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诸科十七人,上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⑤所取诸科人数超过了进士科。次年(973),李昉知贡举,人诉其用情取舍,太祖于是“令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宋)准以下,乃御讲武殿,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⑥在此举中,除《九经》外,诸科已收录齐备。

①柳开在《请家兄明法改科书》(《河东先生集》卷七)中,以贤良科为“上”,进士科为“次”,《礼》、《传》诸科为“下”。“贤良”属制科,与常科不同类,可不论;进士、诸科相较,无论在授官拟职还是在社会舆论的认可度上,后者都明显低于前者。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曰:“到得本朝,(进士与明经)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官之类。”

②《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

③见《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三。

④《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

⑤《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三》。

⑥《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三》。